



5

東土圖書公司

抑鬱與超越

——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

遼耀東著



5

東大圖書公司

抑鬱與超越

——
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

遼耀東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抑鬱與超越: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/ 遼耀東著.——初
版一刷.——臺北市:東大, 2007
面; 公分.——(糊塗齋史學論稿)

ISBN 978-957-19-2782-4 (平裝)

- 1.(漢)司馬遷—學術思想—史學
- 2.史記—研究與考訂
- 3.史學—中國—西漢(公元前202—公元9)

610.11

96006344

◎ 抑鬱與超越
——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

著 作 人	遼耀東
責任編輯	吳焰財
美術設計	郭雅萍
發 行 人	劉仲文
著作財產權人	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發 行 所	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	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電話 (02)25006600
	郵撥帳號 0107175-0
門 市 部	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出版日期	初版一刷 2007年5月
編 號	E 620570
基本定價	捌 元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	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9-2782-4 (平裝)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出版說明

《抑鬱與超越——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》是遼耀東先生的遺著，共有正文八篇、附錄三篇，為其畢生研治《史記》的心血結晶。

本書自二〇〇四年一月起，即已陸續交稿排校，書名幾經斟酌、改動，方才定案。其後，先生更耗費一年半時間，仔細校閱書稿的行文、論據及引文出處，務求盡善盡美。稿樣校畢，先生即著手撰寫書序，題名「殘燈」。豈料屬稿未定，竟遽歸道山，留給後人莫大的遺憾與懷念。

先生要在「殘燈」中表述的深意，今已無緣得見，為了彌縫這個缺憾，故敦請先生兩位弟子李廣健、陳識仁為本書撰寫「導言」。由於恐怕仍有遺漏，遂請先生另一弟子黃清連襄助，校閱一過。三位先生追隨遼先生有年，情同父子，而且學術上各有專精，最為知曉先生思想學問。透過「導言」可使讀者明

瞭全書要旨及體系，而「殘燈」手稿，則如實呈現於後，以傳達太史公撰史暨先生著書「抑鬱與超越」之心境。

本局劉董事長與逵先生論交半世紀，時相與把酒談笑，敘舊遣懷。本書之面世，亦可聊償故人心願矣。

東大圖書公司編輯部 謹識

錢江

司马迁下值归来，出得宫南門，沿着翠玉的御道緩々走到他
的車乘停歇處，佇足翹首仰望，十二月的朔風，自宮松樹蒼蒼的丘
陵呼嘯而來，捲動了灰白天空裡低沉的烏雲，沿着管之的宮殿流滾下
來，在整々黑々的宮瓦迴繞在黑々的整々的宮瓦間，不停地翻騰滾動着，
使原本得靜謐的建章宮更得玄神秘莫測了。

司馬遷深知了一口气，~~剛向他~~武帝要差面這大半平他隨侍軍營在外。現在回到京城，但隔過一個月又直接隨上赴雍，上，是司馬遷前人所沒對武帝的稱誦，這稱誦除敬畏外，還有些微的諷諷，自元漢二年他因李陵事件下獄，受杖，~~被~~留在獄中，在武帝身中他中官令的工作，在武帝身旁負責文書處理的工作，他們召召間似乎比往日更親密了。所以，出宮前他向武帝稟告一聲，武帝正在全寢，他怕在正出的時候，珠紗帳內傳出武帝微弱的聲音。（是子長嗎？）

是。司馬遷輕聲答曰。然後又靜。遂向武帝行脫帽禮。

「早去早回呀。」武帝自榻上撑起身子，司寇遂急忙做间恨子去扶持，武帝拈着手之后说：「子长，你面查与廉望裡藏有什么东西？」

于是，司马迁低声回答，心说：~~我今天进屋裡~~，他今天在这屋裡已经搜查
了好幾遍了。武帝说的東西，是個糊塗不明朗的小人，上面有武帝与史丹八字，
史丹八字。~~这是去年十一月~~五年十一月，巫蛊事件發生，江充为报宿中巫毒，
引太子到巫室，掘得一個小桐木人。

自此之後，武亭性情大變，~~武亭學刻印錄~~武亭學刻印錄，左右邦為亞述視通他，後合聯立，於是司馬遷恨前帳後，稍覺陷底，仔細搜查一遍，忽得說並近所條，充池如急武亭才安心品來，抗紅，說此古語，司馬遷欲行又老到月，到前將約帳整如，看見着帳內武亭已經睡第3，教一枕散孔的夢，因親記着刺瘦的臉臉，眼睛淚流，下的對胡說這着次說別級呼，起仇着，司馬遷一司馬遷情之退出，他似難相信司馬遷在帳內瘦好，善男與常的若人，竟天下力力力主筆者，而且其力而日對記帳力的掌聲中

真的成了給字多人了。

抑鬱與超越

——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

目次

出版說明

導言：抑鬱與超越 / 1

〈太史公自序〉的「拾遺補藝」 / 45

「通古今之變」的「今」之開端 / 119

武帝封禪與〈封禪書〉 / 185

〈匈奴列傳〉的次第問題 / 219

對匈奴問題處理的限制 / 271

列傳與本紀的關係 / 309

史傳論贊與「太史公曰」 / 349

「巫蠱之禍」與司馬遷絕筆 / 389

附錄一：沈剛伯先生論「變」與司馬遷的「通古今

變」 / 433

附錄二：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 / 453

附錄三：前不見古人 / 477

導言：抑鬱與超越

漢武帝時代是一個空前變動的時代。

漢武帝自建元元年（前一四〇）至後元二年（前八七），在位共五十四年。自建元元年（前一四〇）至元封元年（前一〇），司馬談任太史前後恰三十年。司馬談卒後，司馬遷繼任太史，至征和二年（前九一）〈報任安書〉說：「得待罪輦轂之下二十餘年矣。」武帝崩於後元二年，司馬遷或也在此時前後不久棄世。

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，侍從武帝左右，或從巡幸天下，或侍議中廷，前後經歷了整個漢武帝時代。司馬氏父子因為職務的關係，久處於政治權力結構中心之內，他們雖然不是決策者，卻親歷每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。對這些重大歷史變動，感受更深。而且記錄與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，因此他們感到有責任將這些親歷的歷史變動記錄下來。所以，司馬談臨終對這個願望仍念念不忘，囑託司馬遷他所欲論載的，亦即其個人所經歷的漢武帝時代。其後司馬遷繼承其遺志，「悉論先人所次舊聞」，開始撰寫《史記》，其與上大夫壺遂討論其所欲撰



寫者，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漢武帝時代。

司馬遷在撰寫《史記》過程中，因遭遇「李陵之禍」，內心鬱結，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，讓後人認為司馬遷在《史記》裡對現實政治「微文刺譏」，因而視《史記》為「謗書」。當然，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中，將其個人際遇的鬱結，有意或無意融於《史記》中，也是非常可能的。至於「微文刺譏」，誹謗今上，即使他想這樣做，在當時現實的政治環境下，卻是不可能的。不過，《史記》雖非專為司馬遷個人鬱結而發，但司馬遷撰寫《史記》時，遭受現實政治的壓抑，並且身受其摧殘。如何超越現實的桎梏，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，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，是司馬遷頗費思量的問題，值得深入討論。

司馬遷所創造的紀傳體，成為後世歷史寫作遵循的形式之一。《史記》是由一百六七十個主要人物編織而成，那裡有帝王將相之輩，也有雞鳴狗盜之徒，有慷慨悲歌的義士，也有窮途末路的英雄。這種歷史寫作形式讓後人產生一種錯覺，認為中國紀傳體是以人為主。事實上，中國的紀傳體本以敘事為主，和編年體一樣，同樣敘述歷史事件發展的過程，以及演變的因果關係，所不同的，編年體是以年繫事，紀傳體則以人繫事而已。司馬遷以孔子的《春秋》為藍圖，創造中國史學的新形式。《史記》的結構分為本紀、表、書、世家、列傳，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，即《太史公自序》所謂「二十八宿環北辰，三十輻共一轂，運行無窮」。

本紀為歷史發展演變的中心若北辰，年表以時間縱向貫穿，八書以時間橫向相聯形成一個軸心，世家、列傳輻輳，形成一個向前運行的歷史巨輪。從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體系，互不相關，但事實上各篇間卻有無形的邏輯關聯性。司馬遷融合中國古史寫作的形式，鑄造成中國史學新的版型，並一直影響著中國兩千年史學寫作的形式。

一

司馬遷在〈太史公自序〉和〈報任安書〉兩次提到「成一家之言」，雖然這兩處地方追求的目標一致，但表現的意義卻不相同，進行的程序也有先後之別。前者是對孔子刪《詩》《書》、定禮樂以來的學術發展與演變，作一次系統的整理。後者是將整理過的材料，納入時間框限之中。二者綜合起來，就是司馬遷撰寫《史記》的意旨，也是他對中國學術與史學的貢獻所在。

漢武帝時開始的圖書校整，規模較成帝時大。劉歆《七略》謂「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，百年之間，書積如山」。漢武帝時有計劃大規模搜集軼書，並建立典藏制度，設置太史令管理與整理圖書。圖書典藏和整理是一體兩面的工作，擔任校書工作的就是司馬氏父子。司馬談為太史，整理石室金匱的圖書，負責保管國家的文獻與檔案，就必須對相關

資料進行整理校讎。章學誠根據《漢書·藝文志·詩賦略》收載「上所自造賦」，認為班固以劉向、歆校讎祕閣的工作成果為藍本。而劉氏父子的工作成果則其來有自，源於漢武帝時所編的目錄。這部目錄很可能就是司馬遷校書時的記錄，但沒有成書，後來司馬遷撰《史記》時分散於書中各篇。其底稿或仍有流傳，或藏於祕府，劉向、歆將這份底稿納入己書，至班固時因循而成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

司馬遷在《報任安書》自嘲「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」，「文史」所指就是文字處理，以及保管和整理圖書檔案工作。《太史公自序》記載司馬談「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，乃論六家之要指」，正是太史掌管圖書工作具體的表現。司馬談在工作過程中，選擇黃老作為主導思想，並提出《論六家要指》，是中國傳統目錄學最早的序錄。司馬談壯志未酬身先死，司馬遷繼其遺志，接續校整圖書，其目的就是為了研讀和了解古籍。司馬遷遂以公孫弘「明天人分際，通古今之義」為基礎，向「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過渡，雖僅「義」與「變」一字之易，卻創立了中國的傳統史學。

戰國以來，百家爭鳴各顯其說，學者不務綜其終始，欲一觀諸要難。另一方面，先秦書籍經秦火焚銷散亂，不僅引起司馬氏父子的感嘆，也為他們的工作帶來實際困難。所以，司馬談在奉命整理圖書時，似乎就立下心願，對孔子校整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以來的學

術發展與演變，作一次系統的整理。孔子是保存先秦文獻的第一人，先秦典籍經孔子刪定，對上古學術發展作了第一次的集結後，自此之後中國文獻始有可稽。至漢武帝時校書祕閣，司馬氏父子對孔子以來的學術思想演變作系統的整理，是為第二次的集結校整。

漢初至漢武帝百餘年間，在不同階段因不同的政治需要，曾對不同類別的圖籍作過初步整理，這些圖籍最後都集中在司馬氏父子處。他們就利用這個基礎，完整而系統地整理這些圖籍。所以，司馬氏父子不僅是劉氏父子的先行者，並且為以後中國目錄學開闢了新的道路。

就目錄學的發展而論，《呂氏春秋·不二》對戰國以來的「天下之豪士」，作扼要定調，目錄學始見端倪，但對其學術流派卻未作具體的劃分。到《韓非子·顯學》，才初見學術流派的傳承。及至《淮南子·要略》提出縱橫、刑名和法等學術流派的名稱及其承繼，仍然沒有對戰國時期學術流派的發展與流變，作整體的分析與討論。淮南王劉安與司馬談同時，目錄學發展至此，辨章學術流派的雛形已出現。中國學術思想經孔子第一次清理後，演變到這時已歷五百年，迫切需要再一次的清理。於是，司馬談利用校整圖書的機會，對國初以來駁雜的學術發展與流變，作一次徹底而系統化的整理。更在儒、墨之外，提出黃老之學。

司馬氏父子首先提出對漢初政治發生重大影響的「黃老」，是當時學術的主流。曹參在漢初援黃老人政治，後來又繼蕭何為丞相，仍用黃老術。司馬遷對曹參以黃老治國，予以很高

的評價。《史記》對秦楚之際的黃老以迄蓋公、曹參的承傳關係，作了詳細的敘述。司馬氏父子認為，黃老之言出自齊之稷下。慎到、接子、田駢、環淵、尹文、宋鈞同為司馬遷所謂的稷下之士，他們的著作，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分別置於〈諸子略〉的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小說家等類中。雖然類別不同，但卻同樣是「其言黃老意」。司馬遷將老子與韓非合傳，並附申子，皆因其學皆源道德之意，亦即黃老之學。這些稷下學士，是戰國諸子學說形成前，流行一時的學術思想流派。他們對後世包括道、法、名、陰陽等家思想都發生影響。所以，司馬談才會以黃老概括與統率陰陽、名、法、道德諸家的形成與發展。並在此基礎上提出〈論六家要指〉，對戰國以來的學術發展與流變，作系統化的整理與總結。並對經過系統化整理的學術流派，予以固定的分類名稱，劃清不同學術流派間的範圍。這種分類後來為劉向、歆所繼承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〈諸子略〉即以此為藍本形成。不僅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〈六藝〉與〈諸子〉由此而出，司馬氏父子的工作更進一步支配了以後簿錄之學的「經部」和「子部」的內容。這兩個範疇劃定後，史部之學隨之逐漸萌芽。

司馬談任太史令近三十年，負責校整圖書，並以在校整過程中搜集到的材料，準備撰寫《史記》。司馬談卒後三年，司馬遷接任太史令，繼續司馬談未竟之業。太初三年，司馬遷開始撰寫《史記》，而司馬氏父子校整圖書的資料，則分散於書中有關章節中。劉向、歆未敘《七

略》由來，但在此以前必有傳授。若溯其來由，則諸子十家，可觀者九流，實淵源於《論六家要指》，諸敘錄則承司馬遷著書諸人的列傳而來。《史記》對著書諸人著述由來、承傳所自、著述要旨，彼此之間的學術關係均有交代。後來，劉向、歆校書的敘錄，一準於此。把這些資料匯集起來，就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〈諸子略〉、〈詩賦略〉、〈數術略〉的資料來源與淵源所自。

司馬氏父子生存的時代環境各異，司馬談生當黃老作為政治和學術思想主流的時代，所以確有「先黃老而後六經」的傾向。而司馬遷除了繼承其家學外，又曾問學於孔安國、董仲舒，加上漢武帝時，政治與學術發生空前的轉變。為了遷就現實，司馬遷的學術思想也作出調整，把孔子從儒家中分出，超越諸家之上，提升到「至聖」的地位。

孔子繼承了周代六藝之教的傳統，為著教學需要，對上古以來的文獻作了一次系統的整理、校整編次。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藝，是周代王子貴胄文武合一的基礎教育。春秋戰國之際，戰爭形式由車戰轉變為短兵相接，文武合一開始分途。專於武事的射、御退出六藝之教，技術性的書、數也排除在外。另一方面，卻添補了知識性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。文武合一的六藝，遂轉化成知識文化層次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四教。孔子不僅深刻體認六藝的師儒傳統，而且掌握了六藝轉變為四教的趨勢，再納入《易》與《春秋》，和以往六藝之教

全然不同。至《史記》始將孔子教學內容謂之六藝的名稱固定下來，並在〈儒林列傳〉把孔子系統整理六藝文獻資料的背景與過程，作清晰的說明。這是中國學術發展重要的轉變，使原來王廷獨尊的知識，轉變為社會普及的文化。這傳統到漢武帝時代發生了變化，孔子六藝與儒家合而為一，依附於政治，超越諸家之上。於是，六藝又由社會回歸到政治，淪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。

司馬氏父子對周秦以來文獻資料的整理，不僅對戰國以來新興的學術思想予以歸類，並將孔子所成的六藝，超越諸家之上，鑄定以後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版型。司馬遷將孔子的六藝傳統，獨立並超越現實政治之外，自成體系。又把儒生經典化的六經，退處九流，這就是〈儒林列傳〉創立的原因。司馬遷似有意以公孫弘貫穿整個〈儒林列傳〉，詳述諸經師傳經的情形，並具列受經的諸弟子，然而卻不言弟子傳經以廣師說，僅言某至某官，秩若干。所言並非記敘六藝學術的承傳，而是論六經依附政治為經典後，成為利祿之途庸俗化的過程。所以，孔子六藝，與罷黜百家後的六經，有學術思想與政治現實的不同，有古今之變的「古」與「今」的差異。

所以，《史記》內外，有兩個「成一家之言」。前者是對上古的學術作一個系統的整理。後者則是為中國史學拓創了新的途徑。唯有從這方面探索，才能發掘司馬遷《史記》對中國

學術與中國史學所作的承先啟後的貢獻。

司馬遷所謂「通古今之變」的「今」，即其所撰《今上本紀》的「今」，也就是司馬遷個人所生存的漢武帝時代。漢武帝時代不僅是漢代，也是中國歷史重要的轉變時代。漢武帝選擇儒家思想作為政治指導的最高原則，並以此塑造以後中國君主的專制統治體系。這種統治制度，司馬遷釋之為「一人有慶，萬民賴之」。換言之，就是君主絕對權威的樹立。

後來，司馬遷因為替李陵游說而「誣上」，卒遭吏議，「與法吏為伍，深幽圜牆」，更於天漢二年被處官刑。他對君主的絕對權威，以及其統治工具酷吏的暴虐，有切身體驗，感受深刻。因此，進一步探索漢武帝「一人有慶」的由來，可能是他撰《今上本紀》，或發憤著《史記》的潛在原因。

雖然，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，以及七國之亂後，地方王國勢力不削自弱，功勳舊臣凋零殆盡，為漢武帝「德歸京師」，也就是權力集於中央的大一統的局面，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。但是，司馬遷卻選擇了田蚡，作為漢武帝由「德歸京師」過渡到「一人有慶，萬民賴之」的開端。田蚡是漢武帝的舅氏，漢武帝即位後擠進權力核心，當時漢武帝所有「計策」，皆出於田蚡。田蚡就利用儒術為政治鬥爭的工具，挑戰掌握宮廷三世權力，而且崇尚黃老的竇太后。最後，田蚡雖然失敗，但仍隱藏於幕後弄權。直到竇太后病逝，田蚡復出為丞相。田蚡